

● 中华全景百卷书
道德礼仪系列

35

中华美学趣尚

袁济喜
● 京华出版社

中华



xc29/05

中华全景百卷书

○道德礼仪系列○中华美学趣闻

袁倬喜

98
京华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100卷分10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100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100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100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45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 委 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 星

总编委会主任: 李志坚

总编委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编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 红	王 伟
王 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 达	刘 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绶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 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绶祥

陆道中	武 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 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 时	空 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 昌	胡 洁	胡振宇	郝 旭	春 晖
钟 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 冶	浦善新
唐 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 超	葛晨虹	鲁 葳	焦国成	曾令真
谢 军	鄢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伸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帧设计：王 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任自斌 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徐庆全

主旋律的音符

(总 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在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引 言

审美趣尚,是一个人文化修养和个性的重要标志。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尚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性格的投射。

与世界上其他发达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相比,华夏民族在长期的劳作和繁衍生息中,孕育了璀璨瑰丽的审美文化。在中国艺术中,那淡远疏野的山水意境,齐整妍丽的辞赋,一唱三叹的诗歌韵味,纤委幽深的庭院风趣……无不映射出华夏民族丰富深邃的心灵世界,体现出华夏民族的审美趣尚。可以这么说,审美趣尚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点。因此,从审美趣尚上了解我们的民族性格,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反思和剔除那些落后的因素,重建我们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个民族审美趣尚的形成是由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它构成了这个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它民族审美风尚的特征。人们往

往为西方审美文化的风采所陶醉,比如古希腊的雕塑、神话与悲剧作品,以及近代文艺复兴以来的戏剧、史诗、小说和绘画、雕塑作品等,这些艺术瑰宝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人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西方美学理论偏重对主客体的探讨,以崇高、悲剧为最高的审美范畴。而华夏民族的审美性格却有独特的风尚,这就是和谐温厚、含蓄蕴藉,中国古典的小说、戏曲以大团圆为归宿,这些基本特征为人们所熟识。在美学思想中,中国古代也有相应的理论。过去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艺可以与西方争妍斗胜,而在美学思想上却相对滞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古典美学对审美理想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人人相和,物我无际为特征的审美境界。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对华夏民族的审美趣尚着重从理论上加以介绍,以见出我们民族审美性格的方方面面。

一、人文模式

华夏民族的文化肇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及氏族社会形态之中。风调雨顺，嘉生繁祉对远古先民的生存与繁衍至关重要。他们把自己与宇宙天地视作混沌一体。以《周易》为模式的宇宙观便是这种文化意识的体现。在与天相合中求得生存幸福，同时获得美的感受，这是先民以和为美的思想动因。嗣后虽经夏商周奴隶社会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但这种审美文化观念却延续了下来，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以农业自然经济形态为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是宗法血缘关系及观念的长期存在。

我国是古人类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地区。大约从一百万年以前，在广袤的山河土地上，就繁衍生息着人类的祖先。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和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都发现了极为丰富的距今几十万年的远古人类生活和文化的遗址。经过漫长的进化岁月，到距今几万年的山西襄汾的丁村人、湖北长

阳钟下阳家湾的长阳人,广东韶关的马坝圩的马坝人,已经开始摆脱远古的原始人群,逐渐演化为氏族集体,他们已经直立行走。从森林到草泽,从平野到山岗,他们利用自然条件、采集果实、捕鱼狩猎,在进行“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也从事着“人化的自然”的创造活动。终于,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时候,在黄河流域,他们开始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今天保留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是当时先民创造的灿烂成果。

仰韶文化属于黄河文化系统。先民们主要选择黄河各支流,如沔河,浚河和灞河等地域,建立自己的村落,聚族而居。他们的居民点一般是在黄河两岸经过长期浸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者在两河汇流处选择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质肥美,气候湿润,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舟楫。传说中的神农氏大体上相当于这个时期,《白虎通义》中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说明人们在生产形态上的进步,是与对天时地利的掌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对这些自然因素的认识与利用,就会导致灾乱,无法生存与发展。《尚书·洪范》记载了殷朝旧贵族箕子回答周

武王问天道的話，他說：從前鯀用土阻塞洪水，違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給他洪范九疇，世界的和諧被破壞了，鯀也被殺。禹繼承父親的事業，因勢利導，不違水性，上帝賜給他洪范九疇，才恢復了世界的秩序。從這一段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已經意識到，順物之性才能成就事功；逆物之性，就會惹得上天震怒。對天地之和的渴求，催發了古人天人合一觀念的滋生。秦漢時期的《禮記·月令》和《呂氏春秋》都反復闡述了這樣一個古老而直觀的思想：人事的安排，必須合於自然的和諧發展，如獻歲發春，萬物復蘇，是春耕的大好時光，這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禮記·月令》）君主在春天要身體力行，鼓勵耕耘，相反，一旦逆氣而動，春行夏令，夏行秋令，秋行冬令，……就會引起禍亂，不可收拾。很顯然，這是農耕文化氛圍中自然形成的朴素念頭。

天道的運行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依據，這是華夏先民們由此衍生的又一觀念。先秦時的哲學家老子曾形象地把治理國家比作種莊稼，他說“治人者莫若嗇”（農耕）。血族關係是構成遠古人類社會中人与人之间關係的基礎，因為當時極為艱難危險的生活環境迫使先民們必須凝聚成一個堅強的

团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描述黄河流域人们艰苦的生活情景,以及黄河下流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的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炎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①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类只有依靠和谐一致的集体力量,才能对付恶劣的自然环境、猎取兽类,捕捞鱼类,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为此他们组成了氏族部落,聚族而居,他们有共同的氏族活动场所,从事公共会议,节日和宗教性的活动。依靠着这种血亲关系,他们占有着一定的土地和其它自然产物,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氏族的首领是在氏族民主集会上产生的,氏族的一切重大活动,都是在这种会议上产生的。原始民主习惯和古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是人们调节彼此关系的道德准则,传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人人同心协力,和谐相处,“无有相害之心”(《庄子·盗跖》)。进入夏、商、周奴隶制社会后,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被家长制的世袭制

^① 《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2页。

度所取代,根据君王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划分贵贱等级、设爵分位,产生了宗法制与礼乐系统。但它不过是原始社会氏族血缘关系的衍变而已,原始亲睦和协观念依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

从天和到人和,再到天人相和,反映了先民朴素直观的农耕文化意识。它也浸润到审美领域,先民们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相生的大系统,人类是生存于此的一部分,个人只有汇入到群体与天道之中,才能生存发展、自强不息。这种文化意识一方面培养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将个人的价值置于天地自然与社会群体之中。

二、俯仰宇宙

俯仰终宇宙，
不乐复何如。

这是晋代大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名句，意谓片刻之间游遍宇宙，其乐无穷。华夏文明起源于农耕生产方式，观览宇宙，宅心天地，是先民们的审美方式。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先民直接接触到的审美对象。他们将天地宇宙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在和谐相生中获取美的感受，这是华夏民族的一种普遍审美心态。出现在他们心目中的天地是一个四时嬗代，井然有序的自然外物，而不是古希腊人所描绘的凶险难测的大自然，对社会人生，华夏民族也以宁静和熙作为审美理想，陶渊明著名的《桃花源记》便是这种蓝图。

1. 天地有大美

人类最早的审美对象是赖以生存与繁衍的自然界生态环境。中国远古先民遍布于黄河、长江两

大流域,依赖农耕、渔猎来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环绕人类周围的是天地自然。在长期的劳动与生存活动中,先民直观地感到自然界的和谐相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因此,天地之和既是生存的理想状态,也是朦胧的美的理想。宗白华先生指出:“希腊半岛上城邦人民的意识更着重在城市生活里的秩序和组织,中国的广大平原的农业社会却以天地四时为主要的环境,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和天地四时的节奏相适应。”^①从春秋时期开始,理性精神滥觞,使人们将天地自然视为秩序和谐、有条不紊的演化,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儒家崇尚“天行有常”,后来的思想家又把宇宙万物的本根与秩序称为“太极”、“理”,都是强调自然界的本质和谐有序,有其内在规律,体现了一种和谐之美。这是与西方文化与美学不可捉摸的宗教命定论以及世界是由主观意志盲目冲动造成的观念大不相同的。

儒家学说是随着春秋以来殷周传统巫术文化的衰微而兴起的。从孔子开始,就摒弃了“天命”观念,崇尚天地四时更替,节序代谢。孔子赞叹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

^① 《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语·阳货》)你看,苍穹笼盖四野,覆育人类,四时更替,百物繁兴,这一切多么和谐,然而奇妙的是它又丝毫不露造物的痕迹。战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他的哲学与美学中,更是力辟宗教有神论,盛称天地无为无造而又精工自然。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荀子·天论》)荀子认为,自然界本身的和谐相生,四时交替,这就是“神”,没有什么先天的造物主。天地的和谐有序,是儒家最崇尚的生存与审美理想,他们将它上升为宇宙规律的高度来推崇。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中庸》一书的作者反复倡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认为,“中”与“和”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儒家认为这种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法则是相同的,因此,他们又将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用来说明自然界的存在。春秋时郑国子产就提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荀子在另一篇《礼论》中说得更为直捷:“天地以和,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

矣哉!”荀子采取了以天地自然比附人事的逻辑方法,他热烈歌颂天地四时、日月运转的和谐有序,认为这种秩序性就是“礼”,“礼”既是自然的法度,也是人间的秩序。这样,天人就统一于这种至圣至美的秩序法度中。当然,他向往与讴歌的礼,只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理想。

先哲们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社会既品类万殊又互相应和,从差异的角度来说,是“礼”,从相互调和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乐”,他们以音乐精神来说明天地人的和谐。《礼记·乐记》中指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则万物皆化;序,则群物皆别。”在音乐中,宇宙的顺序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是天地和谐之美的结晶。礼乐的本体是天地之和,这一点宋儒强调的最多。如程颐就说:“然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二程遗书》卷18)后来朱熹也强调了这一点。这说明先哲们以和为美,已经超越单纯的自然主义态度,将自然与社会相融会,自然界具有了浓厚的社会伦理色彩。

华夏先民们以和谐为美,这种和谐不是一种封闭凝固的体系,它喷溢着勃勃生气,具有无限的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内部对立统一的宇宙规律